

思想者

国际副刊
专刊

华夏日报社主管主办 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 本期共4版
刊头题字：谭谈 | 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2521-0289 | 数字报：szb.cmpvip.com

主编 | 艾华林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2023年6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三维人生一棵松

——杨维松诗歌印象

■ 苗雨时（河北）

《与姐姐书》的情感承载与艺术表达

■ 范恪劼（河南）

《与姐姐书》出自矢志以劳动安身、以写作立命的诗人马东旭之手。彼时他身处南疆托格拉艾日克这一精神圣地，怀着孤独之心，频频向远在精神家园“申家沟”的亲人倾诉。这部散文诗组章由十三章构成，行文一唱三叹，情感深沉蕴藉，诗意饱满，能穿透虚无、直抵人心。其中，“姐姐”作为诗章的核心意象，既是诗人虚构的情感倾诉对象，又是大于爱情、浓于亲情的情感关怀施与对象，更是诗人在“永恒醒着”的人间里甘苦与共的同命人。诗人借助“姐姐”这一艺术形象，在丰厚的情感承载中，实现了单一抒情主体难以达成的艺术表达。

在诗章中，“姐姐”这一艺术形象凝聚着漂泊异乡的诗人的无限情感。从情感脉络来看，“姐姐”形象有着三重情感承载：

一、抵抗孤独

“姐姐”是诗人远在异乡时故园之思的情感寄托。依据心理学观点，人的情感按价值目标指向不同，可分为对物、对人、对己及对特殊事物的情感等形态。人在孤独时，常以心灵穿越时空，在追溯过往、面对当下、对话灵魂中寻求安全感，对抗孤独，获取亲情感。在南疆深处的托格拉艾日克，马东旭虽有“三亩枣园是我尘世的生命”的耕耘劳作，但孤独却如影随形，成了他无可逃避的痛苦，“我是我体内的一根骆驼刺。贫穷是一根刺，多么可耻。漂泊在托格拉艾日克是另一根刺”“悲伤是体内的殿，孤独是另一个殿”（马东旭《托格拉艾日克》）。于是，身处“天之涯”的诗人，常常“遥想青岗寺的金顶”，思念“姐姐，在宁陵”。他没有选择用爱情告白或颂扬爱情的方式填补边疆时光的孤独，而是向有着胞亲身份的“姐姐”倾诉，完成情感的传达与释放。这或许与诗人独特的自我消解生活痛苦和心灵孤独的方式有关，也与“姐姐”这一形象所肩负的命运使命有关。

二、释放愧怍

“姐姐”也是诗人对无力改变亲人命运的愧怍积聚点。在诗章中，诗人将对亲人命运的悲悯、对自己报效无力的愧怍都倾诉给了“姐姐”。独在异乡，对亲人的思念愈发浓烈，更何况视申家沟为精神家园的诗人。“姐姐，我把申家

沟的小径卷起来。攥在手心。把两岸的一草一木也卷起来，我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。”（《生命》）在天涯荒漠中生活的诗人，怎能放下故乡的亲人与草木。当他谛听南疆“一只蚂蚁搬动麦粒的声音”时，中原腹地里亲人们在生活中倔强又卑微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。然而，命运吝啬，现实残酷，诗人力量微薄，在生活面前，只能向“姐姐”倾诉，“姐姐，贫穷若草木之根。扎进了我们的脉管。”（《不可有悲伤》）诗人深知平原的风正侵蚀着“姐姐”，感应到“姐姐”“清泉一样的双目，有悲伤”，便不断劝慰“姐姐”“不可悲伤”，称赞“姐姐”的美好，“你是指甲花盛开，朴素而美丽。仿佛都是上帝的安排”。（《不可有悲伤》）诗人还痛苦地写下了“姐姐”攀越生死关口时自己的悲痛，“我知道你热爱自然和残破的世界，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系住你飞雪的灵魂。”甚至设想了失去“姐姐”后的寄托，“姐姐，若没有了姐姐，我就把天上的星辰认作姐姐，我让你的仁慈之光，落满申家沟。”命运的无力，悲剧的伤痛，让诗人的愧怍如万箭穿心，发出悲怆的呼告：“那一刻，你属于众神的女儿，母亲喊你，父亲喊你，老祖母在菩萨和金卷面前喊你，我握住你的手，线团掉落的声响也是惊心。我知道你热爱自然和残破的世界，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系住你飞雪的灵魂。”

三、超越痛殇

“姐姐”离去了。在申家沟，有多少像“姐姐”一样的同命人，交出了“微尘弱草的生命”。“我们伸出手掌，捂住内心的雪……但未必捂住内心的雪崩。”（《执着》）诗人的悲伤化作“没有边际的泪水”。“姐姐，我在实相中寻找虚无，在虚无中寻找存在的意义。夜风吹过东平原，和无欲的灵魂，我真的不知道内心有多少片雪花卷飞。”（《夜风吹过》）诗人在痛殇中沉思、彻悟、超越。在命运真相前，他读懂了“姐姐”的另一种真容——“姐姐”素朴又圣洁，平凡又脱俗，虽生命短暂却精神永生；“经历过生与死的人，不忘初心、不惧未来，你原谅了冷嘲热讽，但敬畏神灵。姐姐，你把人间当作一根木头。没有意识。你把人间当作指甲花开，拥有神赐的静美。”（《敬畏》）只有战胜自己，才能找到立身之路；只有放下眼前，才能拥有

辽阔未来。“我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我们是我们最大的迷宫。”走出迷宫后，诗人明心见性、以德报怨，“原谅无法原谅的。包容可以包容的。”（《遇见》），“在寂寞中孤立，在真香中清明。”（《寂寞》），于是，一颗赤子之心的真香远扬：“姐姐，我们是申家沟的一根水草。我们是水草上永恒的灵魂。永恒醒着。永恒站在风里雨里。”（《水草》）

诗人选择“姐姐”作为情感倾诉对象，有着独特的艺术功效。相对于抒情主体，女性在命运的压迫下往往承受更多，而姐姐的血缘人伦地位，让诗人能更坦诚地倾诉。诗人对“姐姐”的这种身份定位，使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是旁观者，而是情同手足的亲人。他对“姐姐”充满痛惜，“在故园，没有一束光洗沐你的伤口”；又有无力救助的无奈，“没有一驾马车，把我们带至远方。”当神也无能为力时，诗人道出命运的真相，“在时间的渡口，我们拽不住神的美丽的瓔珞。你我皆是过客匆匆，人之初是个无，人之末亦是个无。”当诗人从痛殇中走出，以“敬畏”之心将“姐姐”与神明并列于心灵殿堂时，长幼之序也合乎伦理之义。

诗人采用书信体倾诉，更适合表达那些不能向父母倾诉，却能与同代的姐姐分享的苦难，“于此生活，我们活得如意，也活得不如意。我们微尘弱草的生命。”姐姐既是倾诉对象，也是诗人自我发掘的渠道。对姐姐的劝慰、安抚、关爱，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对话与纾解？虽然诗人比“姐姐”拥有更宽广的世界和自性的法喜，但他拒绝城市寄居、疏离体制内生存，执拗地选择以农民身份安身立命，无论身处申家沟还是托格拉艾日克，都能与“姐姐”有同种同命的思考与体认。因此，诗人在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、对“姐姐”命运的感知以及自我人生价值的确立中，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精神操守和人格结构的独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姐姐”可视为“我”的互文，抒情主体与对象之间存在着你我同构、主客共照的关系，在自我与姐姐、姐弟与生活之间，构成了一种在困境中不向命运低头、相互依存、倾听、照亮的生命陈述方式。

“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，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”，古罗马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这句话是马东旭喜欢的，而《与姐姐书》中泪水中散发的生命真香，更让人喜爱。

杨维松诗集中有首诗《在时间中干瘪》，写的是人们对他称呼的变化：“小杨”、“松哥”、“老杨”，表现了岁月无情催人老。从青春年华到渐次衰歇。人到中年，就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，因为这一节点，收获与迟暮并在。检视过往的足迹，谋划未来的行程，便成了中年写作的当下主题。而这主题又恰逢社会转型的文化历史背景，人们的生存陷入以利欲为中心的物质遮蔽精神、灵肉断裂的尴尬处境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又一次纠结着人们的焦虑。

要走出焦虑和迷茫，诗人必须找准自己的精神定位。经过长久的省思与体察，诗人杨维松得出结论，就是要持守生命的本真和澄清的心境，从三个维度上，致力于自我人格的型塑：精神返乡，供奉爱情，再造灵魂。以此支撑起生命的高贵，使之挺拔成一株屹立的青松。

乡土，是人生命的起源，也是种族绵延的根基。人与土地的关系，生成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。现代人也不能脱离土地，因为那里是他生存的根系。即使离开乡村，也可以精神回归，孝敬自己的父母，找回遗落的童年，重建乡土培植的纯真禀赋。所以，诗人魂系乡土。他写“乡愁将回家的脚步绊得踉跄”，急切而欣喜。他回到家中，“每当看到柴门下站着的那把/锈迹斑斑的锄头，父亲的身影/便在我的眼中不停的晃动”（《锄瘦·父亲》）；炊烟压矮了母亲的身躯，野草累弯了母亲的身躯，矮了、弯了的身影仍像张拉满的弓，射出儿女的箭（《母亲的影子》）。乡土上的庄稼曾和自己一起生长。村头河边的老树记载了孩子们的欢乐。乡村的家，是生命的真正的原乡。

爱情，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。它是诗歌恒久的专题，也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负载。男女之爱，总是与热恋、渴望、思念，伤别、失望、痛苦等交缠在一起。他写《相识在雨中》，一把油纸伞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，一次月光对视，便携手走过雨巷；他写“思念犹似江南疯长的野草”，从不停止，很快就弥漫了大地；他写“送别”，“谁都不愿意叫对方看见自己流泪/但更加伤心难过”（《送别的你》）。他从青春时期写作进到中年写作，这些青春之恋，也许是补写，但放在当前的心境中，就别有了一番人生况味。于是，他“两手合十”，祈祷真爱。“等待”，是他诗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。等待，是向往与拒绝的两难；等待，是寂寞与无言的交感。“就到这里”，甜蜜与苦涩同在，疼痛与快乐并存。这样，爱情就是一种复合的力量，既是感性，也是理性。他以智慧扶起了爱的陨落。这种爱超越了古代的传统而具备了现代性的色彩。

灵魂，是人生与死，灵与肉的交搏。人生在世，本来就是繁忙劳神，而如今喧嚣浮躁，熙熙攘攘，庸庸碌碌。然而，沉重的肉体终究要走入人生之大限——死亡。死前，回头检视，是“谁丢失了春天”，那曾经的红花绿草；又是谁忽略了“一条蜿蜒曲折、不起眼的小路”，“让一个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得以亲近”（《一条蜿蜒曲折、不起眼的小路》）？在人间，有多少“无声的喧闹”和“嘹亮的沉寂”，滚滚红尘淹没了芸芸众生。于是，诗人遣世独立，从世俗中走出，他要打开人存在的“死结”，因此，在喷响吹碎的暗夜，他扶起伤神的星斗；“为灵魂腾出哭泣的空间”，他“让神秘的一刻携嵌进人类的灵魂”，并于向死而生中，放飞自己的心灵，关注“一条蚯蚓非常之死”，不肯按下悲惨生活的快门，魂飞汶川、雅安，在废墟之上，斥责阴暗，礼赞顽强不屈的小草，在一片毁灭里，他以悲悯的大爱，托起了精神的太阳！

三维人生，铸造了诗人的人格。一棵青松，扎根泥土，根深叶挺；抗击风雪，守卫真爱；雕刻年轮，浩气内充。它没有杨柳的婀娜多姿，也没有桃李的绚烂多彩，但它却挺拔伟岸、正直高大，以其道劲的枝干，给人以沉思与坚毅。这就是诗人的抒情形象。此种人格风骨，屹立在诗的时空，不仅拓展了诗的精神境界，也照亮了诗的艺术风采。以“松”为主体意象，带动了日月春秋，风霜雨雪，禾稼草木，天空大地等场景，并为它们注入了生命；又以切物和贴近心灵的原创语言为之命名，同时，把它们结构成宏大开阔的文化历史语境。这样，就在现实生活之上，营造了一个属于诗人自我的独立自主的虚幻的审美世界，蒸腾着一种广远、悠深的神秘气韵。从而，形成了天地与立、卓而不群、浩然弥哀、气势如虹的平实而又崇高的艺术风格。

责任编辑 | 王建成 校对 | 卢路

